

往事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第七十七期 二零零九年四月十五日

编者的话：告密之举，缘发于专制政治，但无论在何种文化中，都令人不耻，亲属和朋友之间的告密尤其如此。在文明制度下，告密即使有其必要，亦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勿使其与社会道德伦理相冲突。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上海《大公报》发表一篇署名胡耐安的文章，对当时国民党统治下告密成风，甚至在学校安插“职业学生”痛心疾首，文章认为，告密固然有效，“却不是正常的生理的工具。开诚布公，讲信尚义，是我们处己处人所应有的道德准则；风行草偃，告密实在是毁灭人性斫丧人道的不正常的病理的社会现象。”

解放以后，在一九五一年的“镇反”运动中，天津《新生晚报》发表了一篇无署名的短论，认为“在人民当政的今天，发坏人之阴私是最讲道德和最人道主义的，因为这是以千百万人民大众的利益为标准。”

当“颠倒的世界被颠倒过来”，当人群被划分为对立的阶级，划分为人民与敌人，“发人阴私”这种不道德与不人道的行为就变成“最讲道德和最人道主义的”了。

在进行此类“思想改造”的同时，在“人民当政”的名义下，原有的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或被改造或被消灭，代之以“人民团体”，并使之成为国家权力的附庸和延伸。告密这一权力工具也随之渗透到基层民众之中。

《市军管会人民政府联合通告批准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规约检举反革命分子的各项办法》一文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告密是人民自发的要求，权力不过是体察民情并予以批准而已。文中声明，告密不仅是“人民爱国的权利”，也是“义务”，也就是说，人民没有不告密的权利。

在这一轮全民告密的狂潮之中，人们出于义愤、恐惧、利益、信仰或愚昧而告密，家人、亲戚、朋友、邻居、同乡、同事、师生和同学之间原有的社会人际关系遭破坏，致使四百多万人被杀、关、管，其中七十八万人被处决。读这些荒唐的老新闻，不难设想，在法律被罔顾，被告密被揭发者缺乏起码的人权保障的条件下，制造了多少冤案。

此后，告密被制度化、内在化和道德化，不但建立起庞大的警察机构，并赋予一切居民社区和工作单位具有警察机构的某些功能，也试图使每一个人成为密探和线人，不但监视和告发言行，也监视思想；不但监视和揭发别人，甚至自我监视揭发；而以阶级的名义“大义灭亲”竟成了道德的楷模。

自此，无论是中国传统文明中的“亲亲相隐”，还是西方文明中的“至亲之间不举证”皆遭颠覆，致使在历次运动中父子成仇、夫妻反目、兄弟阋墙的骨肉相煎事件层出不穷……

积重难返，在标榜法制与“核心价值”的今天，告密现象仍未绝迹。好在，随着人性逐渐复苏、社会日益进步，告密行为在民众中越来越遭到鄙夷，那些职业和业余的告密者不得不重新龟缩于权力的阴影下。

终有一日，人民将彻底得享免于恐惧之自由。

“告密”旧文录

反告密 胡耐安

在政治技巧的运用上，“告密”这一事，是颇称适当的“杀手铜”；时当今日，我们自不能追求舍弃桔槔不用那时代的远景，不过机事机心之为物，如果拿来去估计人伦纲常国民道德，孰得孰失？真令我们这批书呆子椎心泣血。

人类的世间，最可宝贵的是亲切真诚。人与人间的交互往还，也都莫外乎此。当然所谓友敌的分野，于此为不该当，于彼也就不免应该当；可是同在同一的国度里，而且有同胞称谓的“自家人”之间，告密这一运用，却耳熟得可怕。假定说古已有之，那决非盛世治世之事，如周厉王的监谤，以迄五代时的寻事团，明季的厂卫，其实那还是设有“专官”其事的，像我们时下所流行的“告密”，却是“途之人”皆可为之事；官任此专的人，只不过限于有任的官之人，而在途之人皆可为说来，几乎是通国之人都难例外的了。

何以有密之可告？何以有密之须告？不外乎为德莫由、导政无制甚至齐刑难措，闻见“尚”此之人的苦心孤诣。物性既不齐，人情更翻覆，知己知彼，搞奸发伏，都得从揭人之密，以求人之私，以窥人之隐，从而以判明人之趋向从违，这难道不是“政治智慧”所应珍惜的要诀中的一诀？然而转问何以有甘事告密之事者？何以告密者能知人之密？何以既密其事者终难密其所密？由此之类的解答，便是背义忘情行险使诈一连串非人性非人情的所致。在甚多告密事件里，失掉亲子之爱，忘却信义之谊，举凡我们所自诩的八德四维等全尽废置莫用。老实说，所谓“密”之一义，在事密者是非所亲所信或者是同事其密的局内人莫由预闻，在告密者也是非如此之类的关系无从得知。当烟禁禁令颁行的初期，设立禁政机构，网罗一千此道中人充当密查人员，缉捕烟犯，时日既久，真正单纯的吸食鸦片烟者，几乎在密查之下告绝，可是密查员的考勤，是以缉获烟犯为率，有一密查员任职两个月，所稔识亲朋好友中的犯有鸦片嗜好者，经已全尽入彀，考勤逼紧会影响到自己的这一份密查差使，在差使和生计的交逼下，联想到推荐自己充当密查员的恩人，他是常常弄鸦片烟玩儿的，终于密告他一下，来保全自己的差使，来维持自己的生计。类此的故事，在时下流行的密告潮中，何况重奖之下，当然更是多不胜数。

不仅如此，推助所及，在我们下一代，也就是给人宝贵为国族基干的青年群，更痛心的是，在培植人才的学校里，也受着此波此澜的浸渐。“职业学生”此一名词的所由来，可说也是告密之风所卵翼而成。长此以往，我们将没有真诚的信念，其实是所丧真诚的信念，尔诈我虞，各掩藏其所已密，各穷尽人之所密；但是事理觉识所启示的，控制人类社会的主要工具，告密此一工具，却不是正常的生理的工具。开诚布公，讲信尚义，是我们处己处人所应有的道德准则；风行草偃，告密实在是毁灭人性所丧人道的不正常的病理的社会现象。其实，假定人人能诚公信义，伊谁有其所密？也自无密之可告，当然也更无密之须告；不过，人世间聪明人之智慧的运用却全在其密，大而国际间的纵横捭阖，小而私人间的爱憎恩怨，从思想的防范，到行为的制止，奥妙是能占人之先的先得一着，这便是密的效用，也便是时下告密潮流行的所以然。我甘自愿承受不智慧少聪明的淘汰，可是我却是无所其密的人，为着我太自私于人伦纲常国民道德的珍惜，所以我有

此反告密的呼号，然而“此心无他”，纵有也只是善意的希冀此一国家此一民族的日进有德，绝不是恶意的诽谤此一国家此一民族的永沦无极。

上海《大公报》1948年11月1日

略论“告密”

在旧社会里，“发人隐私”是被认为不道德的，大家都信守着“自扫门前雪”的信条。确实，在那时候，衙门口并不是说理的所在；有些人因此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能过去就算了。但是坏人们并不就此罢休，他们为逞其私欲，利用“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一点，挟私寻隙，诬良为盗，一封黑信，衙门口就不分皂白地把人绳捆索绑到公堂，因为这是他们弄钱的好机会。就这样，“告密”这个字眼儿在人民心意中便留下了不良的印象。

时代变了，人民自己做了主人，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了，但这种旧影响却还没有完全肃清。自然，先进的、觉悟的人民激于义愤，不甘缄默，向人民政府揭发匪特窃盗的罪行，因而使政府能够迅速破获的，也颇不乏例。这标志着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的进步，这是主要的一面，我们应该看到。但有两种现象仍然存在：一种就是挟私诬告。但这是永远也达不到目的的，因为人民政府必须查得水落石出以后，才据实处理。另一种是袖手旁观，这种行为的思想根源是颇为复杂的，也许觉得“发人隐私”是不道德，也许是认为亲戚朋友的交情超过祖国与人民的利益，也许是虚伪的人道主义作祟——“何苦害人”呢，也许是不相信人民政府会替自己做主，也许是变天思想……总之，这一些糊涂思想，结局都是“高抬贵手”，放走坏人，贻害人民。

在人民当政的今天，发坏人之隐私是最讲道德和最人道主义的，因为这是以千百万人民大众的利益为标准。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为了我们更好的明天，任何人都有权利和义务把自己所看到或听到的一切违背祖国与人民利益的事情向人民政府告发。

天津《新生晚报》1951年3月27日

市军管会人民政府联合通告批准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规约

检举反革命分子的各项办法

（沪市新闻处讯）本市军管会及市人民政府联合发出通告，略称：上海各人民团体所规定的关于检举反革命分子的各项办法，已经审查批准，认为切实可行，望全市各区人民政府、公安局及各人民群众组织一体执行。

上海各人民团体关于检举反革命分子的通知

……为了使各界人民更好地进行检举，特草拟下列检举反革命分子办法，以便各界人民与各基层肃清反革命委员会有所遵循，进一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并正确地领导群众，争取镇压反革命工作的伟大胜利！

一、必须使各界人民群众了解：检举反革命分子是人民群众协助政府镇压反革命的具体行动，也是彻底肃清反革命分子的重要步骤之一。这是巩固人民祖国和直接关系到人民安居乐业的重大问题，所以中央人民政府所颁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九条明确揭示：“对反革命罪犯，任何人均有向人民政府揭发、告密之权。”这是人民爱国的权利与义务之一，只

有人人起来检举反革命分子，人民胜利的果实才能保障，生产建设才能顺利进行，人民才能过安居乐业的生活。

二、各界人民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对于该条例第三条至第十九条所列举的各种反革命罪犯进行检举。为使检举工作顺利地、有领导地开展，各单位可组织关于该条例的学习和讨论，联系已被捕的反革命分子具体罪行，举行控诉、座谈、回忆等大小会议，以正确掌握政策，树立检举的标准。

三、检举手续：

1、检举者最好用真实姓名、地址，如有电话可告知电话号码，以便联系。接受检举的机关和人员应严守秘密，不得泄露。

2、检举时应将被检举者的姓名（真名、化名、别号）、地址（包括固定和流动的住址及往来场所、电话号码等）、具体罪行、外形特征等报告检举机关，材料愈具体愈真实愈好。不得借端诬告。

3、检举人应将以上两点内容以书面、口头或其他任何方式向基层单位的肃清反革命委员会（或其指定的委员）或区人民政府、区公安局进行检举。

4、检举人应采秘密的和个别的方式，避免在集会上公开的与当面的检举，以便侦察、搜集材料和防止混乱。

5、除了正在放火、下毒、破坏，准备进行严重反革命活动的现行犯可以当场扭送公安机关，请示处理意见，任何人不得随意逮捕人犯，以免混乱及防止发生意外事故。

四、处理办法：

1、各区人民政府、公安局，及各基层肃清反革命委员会均应设置检举箱和专门办公室，派定专人负责接受群众书面的和口头的检举并负责严守秘密，照顾检举人的安全。对于威胁迫害检举者与破坏检举的一切不法分子，应予严厉处置。

2、肃清反革命委员会接受检举后，必须认真负责，分别性质、对象，与检举人取得密切联系，组织检举者及其他有关者进行调查研究，并及时报告公安机关。对于其中重大的及特别的案件，必须即刻报告公安机关。

3、接受检举的机关，对群众的检举，应热诚接受、认真重视并有所交待，以严肃负责的态度，尽可能求得迅速处理。

4、各接受检举单位俟材料调查确实后，按检举对象的罪状大小，分别提出处理意见，请求政府予以逮捕或其他处分。

5、凡检举有功者应在案件结束后，呈请区或市的人民政府予以表扬、奖励。奖励是否公开，必须征得其本人同意，其办法另订之。

上海抗美援朝分会

上海总工会

上海市市郊农民协会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工作委员会

上海市民主青年联合会筹备委员会

上海市学生联合会

上海市民主妇女联合会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

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委员会上海分会

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上海分会

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上海分会

上海《大公报》1951年5月11日

天津市各阶层人民检举大批反革命分子

三四两月密告检举反革命案件一千九百余件

(本报讯)天津市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以来,已经进一步保障了生产建设和社会安全,使抗美援朝运动得以更顺利的进展。这一辉煌的成绩,和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与支持是分不开的。由于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广大人民的政治觉悟与警惕性普遍提高,为了保卫自己的切身利益,纷纷检举反革命分子,以彻底肃清反革命活动。据该市人民政府公安局三、四两月的不完全统计,经市民群众向政府密告或检举者,共达一千九百六十七件,每日平均在三十件以上。这些检举人当中,包括着工人、学生、市民、工商界等各个阶层的人民。他们在检举时,一致地表示:我们要普遍订立爱国的公约,保卫自由幸福的生活,保卫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我们不容许任何反革命分子进行破坏活动。

在协助政府检举反革命当中,工人阶级表现了高度的觉悟。天津市私营连生纱厂的青年女工李淑兰,解放以后,经常注意住在她邻近的蒋匪中统特务于大通的活动,她发现于大通不但没有向政府登记,而且还到处造谣。于是她就向政府检举了他。铁路局北站行李房的工人郭有谦,曾经被特务郭满志逼得全家流离失所,解放以后总憋着劲要报这个仇。他认为:这不但是为自己一家而是为许许多多的老百姓报仇。原来郭满志在日伪时,仅郭有谦就知道他杀害、活埋过三十多条人命,而且解放以后还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三月十九日早晨,郭有谦出外买东西回车站时,路上碰巧遇到了他,就追下去,足足追了好几十里路,终于擒获归案。

三轮工会二分会三支会的会员吕清海,当他发现他拉的“客人”尹俊生是逃犯时,想起尚广和抓特务的模范事迹,毅然拒绝了贿赂,把他送交给公安人员。另一三轮工人单鸿滨,亦检举了一个解放后以蹬三轮为掩护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的汉奸特务高洪璞。

在学校里,广大师生为了保卫自己幸福安定的学习环境,也纷纷检举暗藏的敌人。隐藏在师范学院的特务董存义和云照洋,都是一向反人民的职业反革命分子。董犯是蒋匪三青团特务头子熊飞的亲信,解放后不断地造谣破坏,挑拨师生的团结;他自己不但拒不登记,而且阻挠别人坦白自首。云匪则是蒋匪中统局的特务,解放后私藏刺刀、子弹等武器,并私配校内办公室钥匙,偷看同学信件等,企图进行破坏。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以来,该院师生注意了两犯的活动,获得了罪证,一举向公安部门告发,予以逮捕。河北工学院附设工业学校电科一年级同学,也向政府检举了暗藏在该校的反动分子何培毅。在小学校中,类似胡承志等七个小英雄的模范事迹也很多。十一区中心小学一年级小学生蔡义田,在路上看见一个人撕标语,引起了他的爱国高度责任心,他鼓足了胆量上前质问。那人想逃走时,他又追在后边,向派出所报告。后来一调查,那人果然是个特务分子。

在一般市民当中,像姚大娘、王淑兰的模范人物,也是层出不穷的。家庭妇女王秀花,当她和同院孙实申的老婆闲谈时,发现孙实申是一个曾在天津县杀害过很多人命的反革命分子,她就随时注意监视。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以后,她发现孙匪企图逃跑,立即报告派出所予以逮捕。住在六区复兴里派出所管界的袁奎中,也是一个血债累累的反动罪犯。附近的市民李占武,平素就很注意他的活动,时时向派出所反映。后来,李占武听到袁奎中和人议论“风声很紧”,就想到他一定要逃跑,于是就向派出所报告,终于把他逮住归案。青县逃亡地主兼“一贯道”“点传师”高明山,也是经农民李文臣检举后予以逮捕的。

天津市的工商业者,在这方面也有了相当积极的表现。六区谦德庄福兴客居经理王金,一共检举了三个坏分子。其中就有在天津市解放前曾逃往济南后又潜回天津活动的日寇宪兵队特务赵守义。九区西于庄振兴大车店经理徐克诚则检举了拒不登记的“一贯道”“点传师”常庆荣。

为了保卫祖国与自己的安全,觉悟了的人民,与反革命亲属也进行了坚决无情的斗争。

十一区大东织布工厂技师朱会庆，检举了自己的反动弟弟朱会襄。当我公安人员前往逮捕时，朱会襄向他哥哥强横地说：“亲兄弟就这个样呀？”他毅然地回答说：“亲兄弟也不许你反革命呀！反革命就要逮你！”六区复兴里的市民安徐氏老太太，检举了自己的女婿王俊卿，并协助政府搜出他的国民党证、委任状等反动罪证。

1951年6月5日《人民日报》

新中国少年的好榜样

——孔令金是怎样检举她的反动父亲的

（本报专访）十一区八小五年级的学生孔令金，在抗美援朝运动展开以来，深深的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幼小的心灵对于祖国有了高度的热爱，尤其在镇压反革命以后，更明确了什么是反革命、反人民，什么人人民的敌人。这些新的认识与她记忆中旧的事迹联系起来，使她重新认识了她的父亲孔信涛。

清楚记得父亲的反动罪行

她清楚的记得父亲当过伪保长，抓过壮丁，出卖过青年人来肥自己的腰包。尤其使她不解的是在国民党时代，孔信涛常和伪市长杜建时来往，杜建时常坐着汽车到他们家中鬼鬼祟祟的不知作些什么，也不要她们母女知道。母亲对孔信涛的罪恶行为看不过眼，虽会苦口相劝，不但不生效果，反倒遭到父亲的虐待。解放后甚至还不准她学抗美援朝的宣传书。最近，在政府逮捕了大批的反革命分子，全市人民起来镇压反革命的时候，孔信涛更运走或变卖了东西，对家中说到乡下去看病（孔信涛平常看小儿科），对派出所说去唐山要账，于是在三月十五日的那天就溜走了。孔令金更起了疑惑，她明确的认定：“父亲是个反革命分子”。

在思想中掀起了激烈的斗争

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孩子，有着一个反革命分子的父亲，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她的思想中掀起了激烈的斗争。

在这个时候，几年前和她们住在一起的一个皮毛手艺人朱其昌来信向她父亲索还血债，她清楚的记得，这个人是被父亲给偷偷卖掉去作“壮丁”的，直到他被抓时，他自己还不知道已被人卖掉了。这一个最具体的事实，更使她认清了父亲的反革命本质。她作了最后的决定：“检举他！”

但是她立刻又想到母亲，母亲是一个被父亲欺压虐待过几十年的人，过度的折磨使母亲失去了勇气，于是她又下了最大的决心：“说服母亲”。

下定了决心：“说服母亲！”

但是说服母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孔令金同学想尽了各种方法，她觉得生硬的给母亲上政治课是行不通的，于是她先干具体的帮助母亲作起。每晚放学以后，掌灯时分，在母亲的一天劳累之后，买一包瓜子，替母亲哄着五岁的小妹妹，在父亲把东西都几乎卖空了的屋子里，引着母亲谈起十几年来来的凄苦生活。身受的痛楚谁也不会忘记的，母亲含着眼泪回想起孔信涛对待她的“好处”，她受了骗，不知道孔信涛家中还有妻子就和他结了婚，婚后反倒遭到虐待。她给孔信涛炒菜做饭，伺候他大吃大喝，但自己却得去啃棒子啃窝窝头，不时的还要挨打受骂。最惨的是还曾被孔信涛遗弃四、五年，没吃没喝带着孩子去到娘家住。孔信涛还逼着她立了“字据”，不叫她回去时，不准找他。最近他又变卖东西逃走，又想扔掉她们母女。孔令金又引着母亲谈到孔信涛对待别人的罪恶，在母亲心里点燃起愤怒的火焰。孔令金顺势对母亲说：“这样的人我们能够容忍吗？”

母亲也有了信心：“我们不怕他！”

但是几十年来势力的欺压使她不敢反抗，她早已失去自信心，虽是怒火高涨，但是却

无奈的说：“不容忍又怎样呢？”孔令金给母亲擦着眼泪，把从学校中学到的镇压反革命道理和政府惩办汉奸恶霸的政策，解释给母亲听，坚定的说：“我们不怕他！”母亲似乎是看见了一线光明，但是却还有些懦弱，对孔令金说：“我们告他，他的嘴那么能说，我们说得过他么？”孔令金反复的对妈妈讲人民政府替人民作主的道理。告诉母亲：“现在再不是孔信涛的天下了。”母亲终于被说服了。

孔信涛被逮捕了，她感情上没有波动，而且更坚定了

孔令金又得到学校教师的帮助，坚决的走进十一区公所，向人民政府检举了他的父亲孔信涛。在一个星期日的晚上，孔信涛又回来运东西，孔令金和母亲伴着他不会夜里逃走，于是等到天亮，就报告了派出所，帮着人民警察把他逮捕起来。

孔令金没有一点感情上的波动，而且更坚定了，晚上去上缝纫班，预备与妈妈共同维持家庭生活，并在随时准备争取作一个青年团员，为祖国为人民与反动派斗争到底。（松泉）

天津《新生晚报》1951年4月7日

欧秀妹逮捕土匪丈夫

编辑同志：

广东省北江专区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出现了不少群众协助政府逮捕反革命分子的动人事迹。现在我把欧秀妹帮助政府逮捕她丈夫惯匪梁文的事情告诉你们。

欧秀妹是北江专区连县三区洛阳乡金竹山村人。她的丈夫梁文在解放前当过伪保长；解放后又当了土匪；经常杀害、抢劫人民，是当地匪首廖耀庭的得力帮凶。当地群众非常痛恨他；村里民兵多次设法抓他，一直抓不到。于是，农会、民兵、妇女会就经常派人动员欧秀妹，要她捉住丈夫交政府法办，为人民立功。特别是妇女会的干部，经常向她解释作土匪老婆的可耻与为人民立功的光荣。欧秀妹也因为自己受群众的歧视而苦恼。她一方面痛恨土匪，但要抓自己的丈夫，总有些犹豫。她思想斗争了好久，终于认识到自己应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不应包庇土匪丈夫。她就向农会、妇女会提出保证，要在一个月内抓到梁文。

有一天晚上，梁文回家了，她想去报告民兵，又恐怕引起梁文的怀疑。她就想了个办法，对丈夫说：“民兵到处放哨，要抓你；你以后可不要回来，太危险啦！你要什么东西，和我约好日子、地点，我给你送去就是了。”当时，她丈夫和她约定：两天以后的夜晚在菜冲岭山脚下碰头。

第二天，欧秀妹就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民兵队部。在欧秀妹和她丈夫约定的那天晚上，民兵布置好了。欧秀妹带了酒菜，依约前往。当梁文正要吃酒的时候，有一个民兵不小心，把手电筒弄亮了一下。梁文一看不好，就要拨脚向山上跑。这时，欧秀妹就不顾一切地死命把梁文抱住，并大声疾呼：“土匪在这儿，来捉啊！”梁文拼命挣扎，把欧秀妹摔在地上。这时，民兵跑到跟前，把梁文抓住了。

欧秀妹坚决站在人民立场，分清敌我，活捉土匪丈夫梁文的事，立即传遍全县，到处为人称颂。她已被人民选为捉拿土匪特务的女英雄。

广东北江专署 张

《人民日报》1951年5月16日

火车乘客检举反革命分子

编辑同志：

近来，火车乘客不断检举反革命分子。

北京铁路分局公安分处北京护车大队的同志们，在列车上向乘客宣传镇压反革命分子的

政策，启发了群众镇压反革命的认识。在四月十五日、十六日、十八日三天内，经乘客检举，在列车上捕获了反革命分子和逃犯三人。

四月十五日，北京到包头的一五二次列车行至卓资山、马蓝图间，旅客索天壁向护车人民警察检举了车上的逃犯索宿根。该犯因贩卖毒品，被政府判处徒刑一年；他借有病取保回家医治之机潜逃。当经护车人民警察调查属实，即将索宿根逮捕，交十八台车站公安派出所转交政府归案。

十六日，当该次列车至青龙桥站，又有旅客陈德胜向护车人民警察检举了化名为李德荣的反革命分子张立松。张立松在敌伪时期曾任通县牛堡屯伪乡长、伪区队长、伪自卫队长等职，逼粮抓丁，作恶多端。解放后，他抗拒登记，拒交所藏枪支，逃往绥远隐藏。该车人民警察调查清楚他的罪状把他逮捕交北京站公安派出所。

四月十八日，北京至长安一〇五次列车行至磁涧至新安县间，乘客周牛氏检举了车内新安县的逃亡地主张伏。张伏在本村作恶多端，现在地方政府正在觅捕他。经护车人民警察了解，他确是企图潜逃长安。车到新安县后，护车人民警察就把他交车站公安派出所归案。

《人民日报》1951年5月16日

七位小英雄

五月六日是个晴朗的星期天。午后四点多钟的光景，在天津市罗斯福路中心公园的一个僻静角落，第一区中心小学三年级学生胡承志和同学何永森，看见有两个人在那里鬼鬼祟祟地低声谈话。十岁的胡承志装着做游戏挨近时，听到一个说：“今天晚上你就去干。”他们再一接近，这两个家伙就用眼瞪他们。当时胡承志想：这两个家伙恐怕是特务。这时，这两个家伙立起来就向外走。偏巧何永森大便去了，胡承志也顾不得叫他，就随着这两个家伙走出去。跟了一会儿，他想到自己是一个小孩子，怕对付不了他们；报告警察吧，抓错了怎么办？于是，他只好回了家。

到了家，他并没告诉家里人，夜里他连觉都没睡好。他想起老师常常讲到特务的可恨，他想起奶奶常说的一家亲戚十口人被特务勾结日寇杀害了九口的事，又想起《少年儿童》刊物上画的骑小自行车捉特务的黑昭明。他决定明天再去，说不定那两个家伙还在那里开会。这时他又想起他们那班的班长程绍贵比他大三岁，主意最多；杨春生的腿最快。让程绍贵出主意，杨春生去报告，特务准跑不掉。

第二天下午放学时，胡承志便把这件事告诉了程绍贵和杨春生。胡承志要马上去，程绍贵说：“俞老师不是讲过‘做事要有计划’吗？还是先打算一下好。”于是三个人又回教室开了个会。决定一个人把门，一个人在墙外听，一个在面前监视。并且规定好了暗号：伸一个指头是没有事，伸三个指头是快来，伸拳头是赶快集合，一摆手是快去报告公安派出所。

在路上又遇到四个同学：刘钟祺（十一岁）、赵克瀛（十一岁）、司幼光（十一岁）、李华（十一岁）。程绍贵把这事告诉了四人。四人都要一同去。胡承志知道赵克瀛最爱嚷，说：“甭去这些人，惊跑了更坏。”程绍贵说：“团结起来力量大，人多更好办事。”七个人就一齐向公园走去。

他们到公园一看，巧得很，昨天的两个家伙正在那里嘀咕着。这时有个人要往派出所去报告。程绍贵拦住他说：“捉特务要准、要稳。别错了，也别让他跑掉。听听再说。”七个人按计划散开了：两个守门，两个侦察，三个在附近监视。

两个家伙靠背的墙，是有空隙的花墙。胡承志隐蔽在围墙外，只听那个年老的年青一点的说：“找X一块去放火。”“买一些毒药，到X村去放毒。”后来又看他手里拿着一叠钞票说：“先给你一百万元当本，办完了还给你！”又说：“怕啥，今天晚上就去干，干好了多给你钱，你要不做，可得小心，枪把在我手里！”

为了进一步试探，司幼光、杨春生唱起《防特歌》来。那两个家伙直拿眼瞪他们。

这时，胡承志也绕回来了。他想了想，就索性走近那个戴帽衬的跟前说：“同志！我们不知道抗美援朝是怎么回事？朝鲜战局怎么样，你给我们讲讲好吗？”

戴帽衬的家伙用老鼠眼睛向四外望了望，说：“过来！我告诉你！”他呲了呲牙，小声说：“志愿军都退了，联合国军队都打到鸭绿江边上来了！”“啊！真的么！”胡承志用眼瞟了瞟赵克瀛，赵克瀛一摆手，刘钟祺马上向派出所跑去。

隔了一会儿，坏蛋中的一个，起来拍了拍屁股，要走。孩子们看看公安人员还没有来，急得不得了，就在后面跟着一步也不放。这时候刘钟祺还没跑到派出所，正好遇到一位公安人员就报告了。这两个企图进行放毒、放火活动的反革命分子——一贯道点传师王金龙和他的徒弟沈子哲就这样被捕获了。

他们七个人从下课到捕获这两个反革命分子，又跟到派出所做了详细报告才回家，一口饭都没有吃。大家因为高兴都不觉得饿了。赵克瀛说：“我今天比哪天都美！”

第二天早上到学校，大家早知道了。校长、老师、同学们都慰问他们，向他们道贺。同学们还要求这七位小英雄给他们在大会上做报告。

新中国的儿童们除了在学校里好好学习以外（这七个孩子中有一个班长、三个组长。班长常考第一，其他六个孩子的成绩也好），更能运用他们幼小的智慧，协助自己的政府进行镇压反革命的工作。

《人民日报》1951年5月12日